

---

---

**MOSER, Jeffrey. *Nominal Things: Bronzes in the Making of Medieval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Pp. vi + 293.**

劉雲軍

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

---

---

## 一、全書概論

學者們一般認為，傳統中國的金石學研究是從宋代開始的。近代知名學者王國維（1877-1927）對宋代金石學給予了高度評價：「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宋人治此學，其於蒐集、著錄、考訂、應用各方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sup>1</sup>宋代金石學涉及青銅器、石刻碑銘等多方面的研究，內容極為豐富，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們分別從不同角度對宋代金石學進行探討。在多元學術理路的推動下，宋代金石學逐漸衍生出了諸多相關研究範疇，如關於宋代著名金石學者的整體和個案研究、宋代金石學著作研究，以及宋代金石學興起發展原因的探討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衍生出更為細化具體的研究主題，比如宋代篆書、印譜研究等等。2023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布朗大學副教授孟黎予（Jeffrey Moser）的著作《名物——中古中國青銅器的製作》（*Nominal Things: Bronzes in the Making of Medieval China*，以下暫譯《名物》），這是海外學者關於宋代金石學研究的最新成果。2025年，該書獲得了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年度北山堂藝術

---

1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315。

史圖書獎，可見其學術價值已經得到學界的認可與重視。

孟絜予是哈佛大學藝術與建築史系、東亞學系博士，曾在臺灣大學、哈佛大學、東京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任職，現為布朗大學藝術與建築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唐宋時期藝術與知識文化之間的關係。

除導論、結語外，《名物》一書共分三部分七章，每一部分包含兩到三章的體量。與一般專著的寫法不同，本書每一部分都是一個獨立的單元，每個單元都有自己的側重點。第一部分「詞彙圖像」(The Lexical Picture)，包括第一與第二章，重點考察了傳統中國北宋時命名、詞典編纂和經典訓釋之間的連續性。作者探討了古代禮書中簡單化的禮器圖像如何體現原物體的複雜性，即如何通過詞彙描述圖像形塑人們對物體的認識。作者在寫作中引入了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的語言學理論來分析中國古代「名」與「物」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古人通過讀音和圖像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來呈現物體，並相信「名」對於描述「物」具有關鍵作用，這種觀念影響到宋人對金石學的看法。

第一章「作為器的名」(Names as Implements)以《春秋》中的一則故事入手，引出對「名」和「器」關係的討論，進而評述了西方學者關於「名」與「實」的看法，指出「名」和「器」之間的關係建構了詞彙與圖像之間的聯繫。在本章中，作者著重討論漢代許慎(約 58–約 147)《說文解字》，及其如何追溯漢字從古到今的變換，並精心構建起文字與圖像、器物等的對應關係，這種文、圖、物對應的做法也影響到後世。

第二章「描繪名」(Picturing Names)從《周禮》中描述的「六彝」入手，指出古代中國人通過「名」建立起與「器」之間的關係，又進一步通過繪畫展現已不存於世的上古器物，從而將「名」形象化，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器」和「名」之間的關係。作者接下來重點介紹了五代宋初聶崇義纂輯的《三禮圖》，闡釋了聶崇義如何運用辭書學的圖解假設作為古器物「視覺訓詁」(visual exegesis)的框架，將歷代對古器物的文字詮釋整合為圖文對應的系統，形

構出「詞的圖形」(picture of words)與「名的圖形」(pictures of names)相對應的綜合體系。作者進而指出，聶崇義的這一做法在宋徽宗(1082–1135, 1100–1126 在位)時期得到了回應。

第二部分「經驗印象」(The Empirical Impression)，包括第三、四、五章。探討宋人如何用圖像表現器物，並通過簡單線條的方式，將圖像與文字進行對應。這種做法也影響到後世。

第三章「古風」(The Style of Antiquity)，以唐人韓愈(768–824)為例，剖析了中古中國的古物文化。通過細讀韓愈的兩部作品〈原道〉和〈石鼓歌〉，作者發現韓愈對於「名」、「物」兩者之間關係的思考和追求，對北宋的古物學家們的思想與實踐產生了重要啟發。

第四章「變化的推動者」(Agents of Change)指出，宋代古物學的興起與士人們識讀出他們發現的古代青銅器銘文有關。宋代學者們驚喜地發現，自己在儒家經典中閱讀到的一些文字，能夠在現實器物中得到證明，這極大激發起他們對古物學的興趣。作者接下來舉了兩個例子，分別是唐代韓愈的〈平淮西碑〉從豎立到被推倒的過程、宋初文人鄭文寶對嶧山石刻的蒐集，指出唐宋人對石刻看法的轉變，即從早期時人認為的石刻具有永久性保存的特點，逐漸意識到石刻會隨著時間推移遭到各種毀壞，而文字則會保存得更加長久。而歐陽修(1007–1072)注重拓本，特別是保存更多早期石刻面貌的拓片，就是因為他相信這些拓本是連接古今的橋梁。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宋人對待上古青銅器也採取了類似的態度。而北宋人劉敞(1019–1068)則結合了歐陽修對古物的看法，有效地將出土青銅器與上古文明聯繫在一起。

第五章「象徵性的經驗主義」(Nominal Empiricism)以《夢溪筆談》中沈括(1031–1095)對「黃彝」的解釋入手，指出沈括的論述體現了北宋古物學的重要特徵，即「能夠質疑千年來經學積

累的注釋，同時又強化了經典本身作為合法模式的寶庫」。<sup>2</sup> 接著作者著重討論了宋人呂大臨（約 1040–1093）《考古圖》中圖像分類與解釋策略之間的關係，指出呂大臨對青銅器的命名方法「最終構成了中國古代青銅器的標準詞彙，並且大多數這些詞彙在今天仍在使用」。<sup>3</sup> 而後通過蘇軾（1031–1101）對石鐘山得名的考證（即著名的散文〈石鐘山記〉），作者強調了呂大臨的解釋學實踐，與沈括、蘇軾等同時代人對物質世界的研究，存在著共性。而這種研究方法在青銅器研究上也有所應用，即帶著懷疑精神，通過個人考察，試圖在現實世界中直接感知上古聖賢，即「通過更廣泛地觀察世界和自己，他們可以找到更深刻、更豐富的詞彙來表達自己的想法。」<sup>4</sup>

第三部分「示意之物」(The Schematic Thing)，包括第六與第七兩章。作者從宋徽宗時期仿製的鼎圖入手，通過對鼎的工藝、形制的考察，進而探究了朝廷的金石編目者和工匠如何使用呂大臨及其同好們建立的標識方法，以建構出一種器物圖示形式和實物之間關係的新的綜合秩序。

第六章「圖示中的物質」(Substance into Schema)，敘述了宋徽宗青銅器收藏的編目者，將十一世紀古物調查之收獲改編為朝廷前所未有的禮儀體系規劃的過程。通過將十一世紀古物學家的詞彙化策略與《易經》的圖示邏輯相結合，<sup>5</sup> 宋徽宗青銅器收藏的編目者將古代青銅器的形狀和裝飾圖案加以整合，構築出一種形式和意義相連貫的範本，從而實現了朝廷對宋初聶崇義圖繪模式的追隨與突破。而宋徽宗的禮制改革，改變了人們對上古青銅器的看法，將青銅器納入了一個整齊劃一、可分類的制度化系統之中。

第七章「象徵性鑄造」(Nominal Casting)，主要解釋了在還

2 Jeffrey Moser, *Nominal Things: Bronzes in the Making of Medieval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147. 作者按：注釋中該書頁碼均為英文版頁碼，以下不再另行說明。

3 *Nominal Things*, 153.

4 *Ibid.*, 169.

5 孟絜予於書中建議用「圖示」(Schema)來翻譯呂大臨等人對於「象」的理解，即包括視覺化、抽象化，以及自我指涉的過程。

原和合併過程中產生的圖示，如何運用到新的國家青銅器的鑄造實踐中。宋徽宗依據自身政治意圖，重新設計古典文獻中所載的青銅器樣式，並通過命名、繪圖等方式使之具體呈現於新的儀禮體系中。通過使用宮廷古物編目者的圖示關聯，以及禮學家的詞圖對應，宮廷禮器的設計者最終將複雜且歧義的古代器物簡化為形制（*shape*）、圖案（*figure*）、紋飾（*pattern*）三種易於命名的元素。<sup>6</sup> 宋徽宗的禮制改革雖然失敗了，但他圖像學取徑下對青銅器的分析方法卻得以延續，即將器物分解成一系列離散的、可複製的形式和圖案，並且將這些形式和圖案與經書中記載的名稱相對應。青銅器的圖示化（*schematization*）使詞彙圖像（*lexical pictures*）重新成為視覺化儀式經典的首選媒介。

本書最後簡要討論了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探索的古代青銅器的圖示化及其方法，並指出這些作為視覺化技術的知識實踐，可以用於更加需要直觀經驗的博物時代。

作者藉《名物》一書向讀者呈現了宋人對上古青銅器的研究，及其如何影響到後世人們對青銅器的理解和認識，乃至研究方法。正如作者所言，「北宋時期，〔士人〕對經典圖示（*classical schemata*）的重構，改變了他們在現實器物中踐行古物書寫典範的方式。本書的目的則在於解釋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sup>7</sup> 作者的核心論點是：「古代青銅器不僅出現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而且影響了這一轉變本身……通過這樣做，他們（士人）有力地支持了一種新的、更綜合的方法來理解儒家經典中所描述的古代聖賢和先王的規範模式。」<sup>8</sup> 北宋人通過研究青銅器上面的銘文，特別是名稱與圖像之間的對應關係等等，逐漸形成了一套新的思維模式，即「青銅器為宋代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空間，他們既可以尋求連貫且系統的現實邏輯，同時也可以在周遭事物中尋求新的知識。」<sup>9</sup> 此時，士人得

6 *Nominal Things*, 210.

7 *Ibid.*, 5.

8 *Ibid.*

9 *Ibid.*, 7.

以通過青銅器這一物質載體，「格物」以「窮理」。也就是說，宋朝中期儒學的復興，激發了學者們對出土的上古青銅器的研究興趣，而前人對這些青銅器的記載，包括圖像和概念，為宋人重新認識上古青銅器奠定了基礎。於是宋人在大量搜集、著錄和考訂上古青銅器的名、形、意的同時，逐漸將儒家經典話語與物質現實聯繫在一起，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學術研究範式。

根據朱建新、羅振玉等學者的劃分，金石學大致可分為「金」、「石」兩部分，前者包括鐘鼎彝器等古銅器，後者包括碑碣墓誌等古石刻。<sup>10</sup> 本書副標題為「中古中國青銅器的製作」，全書也是圍繞上古青銅器展開論述的，顯然屬於研究宋代金石學中「金」的範疇。另外，書名所指的「中古時期」，根據其內容來看，主要是指兩宋時期（960–1279），且書中還重點敘述了北宋時期金石學的情況。這一時間界定，與國內學者習慣將「中古時期」等同於魏晉隋唐時期不同，需要國內讀者在閱讀時注意。

## 二、中外宋代金石學研究範式的差異

從寫作手法來看，《名物》呈現出西方漢學家典型的寫作特點和學術風格。作者開篇即援引西方語言學理論作為方法論依據，並在寫作思路與方法上展現出濃郁的藝術史特點，這與國內歷史學者對宋代金石學的研究範式有較大差異。縱觀全書，《名物》並非一般意義上就青銅器討論青銅器，而是將青銅器的研究放置在宋朝儒學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甚至可以說，作者想表達的是，宋儒研究上古青銅器的行為，是他們重新思考儒家思想的一個切入點。換言之，青銅器不只作為研究對象，更是考察思想實踐的媒介。這與國內學者更重視研究青銅器本身的理路存在差異。

在《名物》一書出版之前，中文和英語學界均已有一部宋代金石學著作出版，分別是出版於 2011 年的中國臺灣地區學者

10 朱劍心：《金石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一章「石學之名義」，頁 1–3。

葉國良的《宋代金石學研究》<sup>11</sup> 和出版於 2019 年的美國學者陳雲倩（Yunchiahn C. Sena）的英文著作《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風》（*Bronze and Stone: The Cult of Antiquity in Song Dynasty China*，下稱《金石》）。<sup>12</sup> 這兩本著作都是從宏觀角度，向中西方讀者介紹了宋代金石學的內容、特點，以及對於當時和後世的深遠影響。相對來說，《宋代金石學研究》篇幅更大、史料更豐富、內容更全面，也更學術化；《金石》則更類似於對宋代金石學的概述，文筆簡潔有餘，深度稍顯不足。

《名物》的參考文獻中列舉了《宋代金石學研究》和《金石》這兩部作品，說明作者在寫作中參考了這兩部書，必然也瞭解他們的寫作內容和特點。與前述兩書不同，《名物》在寫作中刻意放棄了宏觀研究的方式，而是聚焦於上古青銅器的製作，並從自己擅長的西方語言學理論角度入手，以器物的藝術史分析作為寫作主軸。這樣的寫作方式能夠揚長避短，突顯作者的個人學術修養和研究特色。

通過比較《名物》與《宋代金石學研究》兩書，讀者可以清晰察覺到中西學術傳統在研究範式上的顯著差異。《宋代金石學研究》一書是目前為止中文學界關於宋代金石學內容最詳實的著作之一。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除了基本研究現狀的梳理外，還包括宋人研究金石學的風氣和態度、宋代吉金佳石的發現與聚散等背景介紹。第二章「宋代金石學者與著述」，比較詳細全面地整理了宋代金石學人及其著述（包括佚書）。第三章「宋人之金學」、第四章「宋人之石學」非常細緻地闡釋了宋人的相關研究，比如辨字、辨文、正誤、斷代、命名等等。第五章「宋代金石學與當時學術之關係」，從經學、小學、史學、文學、禮樂器與度量衡器的製作、藝術六個方面進行討論。最後是第六章「結論」。此外還有兩個附表：「宋代金文著錄發現時地收藏表」、「宋代金石學年表」。

11 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臺北：臺灣書房，2011年）。

12 Yunchiahn C. Sena, *Bronze and Stone: The Cult of Antiquit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該書目前已經有中譯本，參陳雲倩著，梁民譯，李鴻賓校：《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如果單純從研究宋代金石學的角度來說，《宋代金石學研究》無疑內容更全面，更能滿足讀者對於這一領域的瞭解。但從引發讀者思考層面而言，《名物》一書則更勝一籌。這兩種寫作手法自然與中文學者更擅長搜集整理史料，英文學者嫻熟於理論和跨學科研究有關。

另外，兩書都使用了一些宋代金石圖片，但用法明顯不同。《名物》中的圖片是推動行文前進不可或缺的內容，作者通過對圖片內容細緻地解讀，向讀者解釋宋人如何思考問題。譬如，宋人如何在器物與儒家經典記載之間建立對應，進而體現其認知與詮釋邏輯。相比之下，《宋代金石學研究》中的金石圖片則更多是起到補充作用，補充作者對某個問題的解釋。

從全書結構來看，《名物》各章之間呈現出逐層推進的層次感，全書三部分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而《宋代金石學研究》則更趨向於傳統敘事，雖然合起來能讓讀者對宋代金石學有更為全面的認識，但各章主題鮮明，可以獨立成篇，分開也不影響理解。

讀者在閱讀中會注意到，作者在寫作《名物》時，對全書的結構做了精心的安排，採用了一種層層推進的方式。《名物》一書共分三部分——「詞彙圖像」、「經驗印象」、「示意之物」——每部分都對應著不同的製作方式，「每部分的導言均聚焦一件代表該製作方式的典型器物。後文則繼續拆解這些器物具有說服力的混合關鍵技術，包括概念推演（conceptual reasoning）、文學修辭（literary composition）、藝術視覺化（artistic visualization）。」<sup>13</sup>

按照作者的構想，這三種不同的生產模式，按照時間順序依次出現：第一種模式出現在東漢的經學研究中，第二種模式出現在宋代古物研究者的考察中，第三種模式出現在十二世紀初朝廷的制禮工作中。其中「第二種和第三種模式各自構成了對前一種模式的批判性回應，它們採用了前一種模式中的一些技術，同時重新配置了決定其操作邏輯的詞語與事物之間的關係。」<sup>14</sup> 應該說，這種環環相

13 *Nominal Things*, 17.

14 *Ibid.*

扣的寫作模式，使得全書層層推進，前後照應，形成一個閉環。

### 三、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名物》作者將金石學作為宋儒面對的成立於漢代至北宋期間的儒家經典的一種手段和切入點來進行分析，從漢代一直敘述到北宋末，從一個長時段來探討這個問題。《宋代金石學研究》更多是一種具體個案的研究，雖然每章也兼顧了時間性，但總體而言，歷時性不強。比如該書第五章，表面上看來，幾乎將金石學與宋代其他學術之間的關係全都介紹一番，然面面俱到之餘，恰恰削弱了金石學在當時社會思想發展中所起作用的重點偏向。《名物》則摒棄了這種大而全的羅列式寫作方法，聚焦於宋儒的思想轉型，將金石學放置於其思想演變的脈絡之中，從而使議題更突出、深刻得多。

然而《名物》雖然在敘述結構上更具完整性，有整體渾一的閱讀感，但也存在內容單薄的明顯問題。畢竟宋代金石學是一個內容十分豐富的領域。但本書真正討論金石學的內容比例很低，更多是從語言學與理論層面進行建構。全書除了強調宋人的「名」、「實」之辨外，更多的細節則放在對一個個器物形制的詳細介紹和解釋上，以此來展現宋人思想的變化。這種寫法的好處可能是給人一種更具體、生動的感覺，但缺點是讓讀者產生一種僅僅通過幾個案例，是否足以支撐起全書結論的疑問？進一步而言，所謂的宋代金石，實際上可分為「金」和「石」兩部分，宋人對待器物 and 文字時的態度是不一樣的。這一點《宋代金石學研究》第三章、第四章已經做了明確的區分研究。而《名物》中反覆強調的「名」、「實」之辨，其實更多是宋人對器物的看法，對於銘文，宋人明顯有著不同的認識。所以，正如本書副標題所言，本書是對上古青銅器的研究著作。而作者在討論青銅器時，又時不時將其與石刻碑銘的材料混在一起討論，比如《說文解字》、嶧山銘文等等。在討論過程中，應時刻警醒讀者這兩種研究之間存在的差異，《名物》在這一點上明顯做得還不夠。

宋代金石學研究的勃興，受到當時儒學思想的影響，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已經有過討論。<sup>15</sup> 不過既往研究往往是將金石學作為儒學思想復興下的被動產物，而《名物》將宋代青銅器的製作和研究納入思想史的範疇，揭示了宋人的青銅器製作對當時儒學思想有主動影響。這一思路為學界認識宋代金石學的價值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是頗具學術意義的。

此外，作者在將青銅器與更大範圍的宋代思想史結合討論時，發現了確實能夠提醒以往學者的、他們所忽視的問題。比如作者指出北宋古物學家在對青銅器進行銘文辨析、器名判定時，秉持著質疑前人，但同時堅持儒家經典記載的做法，此一態度與北宋中期興起的「疑經」思潮不謀而合，<sup>16</sup> 甚至可以說正是這種思潮下的產物，這為理解宋人「疑經」思潮的批判精神提供了新的佐證。

《名物》一書中經常可以看到作者的一些精妙想法，不過有些論點有待商榷，比如作者認為「這種對聖賢製作和古典文本之間再現差距的高度關注，使後來被稱為『道學』的綜合詮釋學得以成立；而這種關注正是源自並延續於將青銅器翻譯成經典名目的努力」。<sup>17</sup> 這種聯繫青銅器研究中產生的思想與宋代「道學」發端的看法確實十分新穎，但很可惜作者並未給出更多史料佐證，使得這個看法更像是一個大膽猜想。另外，根據目前海內外學者關於宋代「道學」起源發展的研究，尚未有學者論及宋人在青銅器研究過程中產生的思維對「道學」的影響。作者若想將這一看法坐實，還需要提供更加豐富詳實的史料，否則難以令人信服。

此外，本書書名是「中古中國青銅器的製作」，但縱觀全書，這一「製作」(making) 概念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青銅器的物質生產、

15 相關研究成果，如楊思炯：〈北宋時期的宋學對宋代金石學發展的影響〉，《綠色中國》2019年第8期，頁68-75；劉心明：〈略論金石學興起於宋代的原因〉，《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76-81；羅昌繁：〈雅好與政治：宋徽宗的金石情結與碑刻政治——一個心理史學研究的嘗試〉，《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5期，頁66-77。

16 相關研究成果，如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1980年）；楊新勛：《宋代疑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17 *Nominal Things*, 164.

製造，而更多是指宋人對青銅器的認知和建構。宋人對青銅器的研究，主要聚焦於蒐集、著錄、考訂等工作，普通宋人根本沒有辦法復原上古青銅器。宋代真正大規模復原古代青銅器，主要是宋徽宗朝廷主持進行的。宋徽宗致力於蒐集青銅器，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服務於政治與文化的崇古、復古活動。<sup>18</sup> 雖然這一復古實踐都離不開前人的研究，甚至很多方面與之前北宋人如歐陽修、呂大臨等人的做法一樣，但閱讀時仍然需要區分兩者在青銅器研究上的差異。很可惜，本書在這方面著墨不多。還有一點就是，全書七章雖然幾乎每章都會詳細討論一件或幾件青銅器物，但真正討論宋代青銅器研究的內容不多，更多的是用作鋪墊或背景介紹。這使得整部書閱讀下來的感覺是，宋代金石學內容略顯不足，很多問題沒有詳細展開，未能體現該學術議題本身的豐富性。

總體而言，《名物》一書是一部西方學者撰寫的、帶有鮮明海外漢學研究著作特色的作品：獨到精巧的寫作布局、匠心獨運的寫作思路和切入角度，同時書中時常出現的理論分析，使得本書的視野更加開闊。上述優點，都是值得中文讀者學習的。然後，書中提到的一些具體結論和觀點仍有推敲空間，可以作為一種說法來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宋代金石學，但不必盲目全盤接受。正因如此，我們在閱讀此類海外漢學著述時，尤應在肯定其學術價值之餘，亦時刻保持必要的學術判斷力。

---

18 比如伊沛霞的著作，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